

理想与现实

—匈牙利改革过程

〔匈〕亚诺什·科尔内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1.5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科尔内继《短缺经济学》、《矛盾与困境》等专著之后的又一部力作。科氏在本书中对匈牙利30多年来的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坦率的分析与评论。科氏描述了1968年改革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给匈牙利经济带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匈牙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各种设想与匈牙利的现实进行了对照。读者在读过本书后会注意到：匈牙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现象与我国当前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匈牙利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我国研究与借鉴的。本书在论述方面具有与《矛盾与困境》同样的风格：启迪思想，开阔思路，可读性强。

本书可供从事经济、政治、社会的研究人员及实际工作者，高等院校的师生参考。

JÁNOS KORNAI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LV (December 1986)

理 想 与 现 实

——匈牙利的改革过程

[匈] 亚诺什·科尔内著

荣敬本 邱树芳 译
高新军 詹小洪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翠微路22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印张 7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ISBN 7-5017-0041-9/F·135

统一书号：4395·135 定价：1.00元

译者前言

《理想与现实——匈牙利的改革过程》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为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文献》杂志写的一篇专稿，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4期。

在这一长篇论文中，科尔内既作为一名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又作为一名亲身经历匈牙利经济改革过程的普通公民，对匈牙利30多年来的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坦率的分析与评论。科尔内描述了1968年改革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给匈牙利经济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匈牙利经济改革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各种设想与匈牙利的现实进行了对照。科尔内指出，目前的匈牙利并不象许多西方学者所概括的那样已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由直接行政控制变为间接行政控制，市场机制在匈牙利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尚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匈牙利改革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与我国当前的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匈牙利利用痛苦和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通过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系统而切实的研究和总结，正在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宝贵财富，当然也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科尔内写作本文时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满足我国读者深入研究的需要，我们将参考文献的英文目录附于书末。

由于时间仓促，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第七章曾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发表过，在本书出版时，其中某些译文经吴敬琏同志作了校正，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概念的澄清	5
2.1 经济体制	5
2.2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	6
2.3 改革	7
第三章 国有部门	8
3.1 指令性计划的废除	8
3.2 双重依赖	11
3.3 软预算约束和弱价格反应	16
3.4 企业规模分布和垄断	19
3.5 小结：从直接行政控制到间接行政控制	20
第四章 非国有部门	23
4.1 题外话：农业改革	23
4.2 非农业合作社	26
4.3 正规的私营部门	28
4.4 非正规的私营部门和第二经济	30
4.5 各种组合形式	34
4.6 小结：积极地面向市场和众多的行政限制	35
第五章 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	37
5.1 计划制定	37
5.2 财政体制	38

5.3	货币体系和资金市场.....	39
5.4	劳动市场	42
5.5	小结: 各社会部门既和平共处又相互竞争.....	43
第六章	紧张与不平衡.....	45
6.1	传统的短缺经济.....	45
6.2	短缺的存与亡.....	48
6.3	通货膨胀.....	52
6.4	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	54
6.5	个人选择和收入分配.....	57
第七章	设想与现实的对照.....	61
7.1	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61
7.2	天真的改革家.....	65
7.3	加尔布雷思社会主义.....	68
7.4	激进改革者.....	71
参考文献		75

第一章 导 言

匈牙利的经济体制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重要的变革，每个匈牙利公民都感到了这场变革的冲击。而且，匈牙利改革实践的影响也远没有局限于这个东欧小国，至少这种相同道路的诱惑力已出现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的领导人仔细地研究了匈牙利的形势，并从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苏联和其他许多东欧小国中，虽然那里真正的改革尚未开始，但很多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也经常提到匈牙利。毫不夸张地说，匈牙利的改革已具有了某些世界影响。

按照流行的观点，匈牙利经济已经变成或接近于一种“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参照奥斯卡·兰格著名的社会主义模式(1936—1937)，保罗·阿·格雷戈里(Gregory)和罗伯特·斯·斯图亚特(Stuart)认为：“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同兰格模式有惊人的相似性”(1980)。我认为对匈牙利改革的这种概括是不正确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论证我对这种观点的否定看法。本文最后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设想”作出评价，并用匈牙利的现实来与之对照。但是，在将现实同“设想”对照之前，需要进行实证性的描述。我也试图回答下列问题：如果不是“市场社会主义”，那么目前匈牙利体制的真实性质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详细分析匈牙利的情况，以避免过分的简单化。

本文是为了本刊的一般读者，而不仅仅是为了比较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专家们写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包括专家们已经熟悉的情况。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不过也使用了

为了说明问题的数据。这里不是想用计量经济分析来支持有严密逻辑的假设。许多重要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答。论文只显示目前匈牙利和其他国家最近的研究水平。

关于匈牙利改革现在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书和发表了上百篇文章^{①②}。因此，本文不可能是各篇论文的机械汇集。它说明了一些主要的选择，但归根到底是用我个人的观点对匈牙利的改革进行描述和评价。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对匈牙利改革的理论背景，它的实际发展的一种“主观”的描述和评价。另外，适当地作些个人的说明。虽然本人的著作在我的祖国有一些理论影响，但是我并不承认自己被公认为改革的“缔造者”之一。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或者任何决策集团中的一员，或者被正式任命的顾问。换句话说，匈牙利改革的伟大成果和缺点都不能算在我的帐上。同时，我过去是，现在仍将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和一个改革过程的批判性的观察者。我希望，这种特殊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我深入地了解事件，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作出坦率而公正的评价。

主观的东西并不等于自己的东西。本文包括了我自己著作中的一些思想，但同时也包括了已被承认有贡献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在某些场合，最早的提出者已无法查考，因为有些思想的提出者是匿名的，现在已属于匈牙利经济学界的民间传说。在某些场合，本文反映了匈牙利广大人民相当普遍的舆论观点，

① 本文参考了英文和匈文的著作。文中的匈文著作字母“H”加以区别。考虑到本刊的大部分读者不能阅读匈文，因此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未收入匈文著作和文章。如需要文中参考的匈文著述目录可写信向美《经济学文献》杂志或作者索取。

② 这里简单列出一些学者分析和评价匈牙利改革的匈文著述：雷热·涅尔什(Rezső Nyers)，玛顿·塔多斯(Marton Tardos)(1978)，乔瑟夫·伯格纳尔(József Bognar)(1984)，拉热劳·安斯洛(László Antal)(1985a H)。非匈文著述有：理查德·波特斯(Richard Portes)(1977)，贝拉·巴拉沙(Bela Balassa)(1979, 1983)，爱德华·埃·休伊特(Edward A. Hewett)(1981)，保罗·海尔(Paul Hare)，哈格·拉迪斯(Hugo Radice)，奈杰尔·斯温(Nigel Swain)(1981)，保罗·梅尔(Paul Marer)(1986a, b)。我从这些著作中获益匪浅。

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一种普遍接受的“匈牙利观点”。在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们少。

考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当读者看完了本文时，他将会对笔者的愿望有清晰的了解。但是，文章只限于实证分析的范围和理论界现在进行的某些讨论；我并不企图提出一种未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蓝图。

因为本文论述了体制的变化，所以它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政治历史领域中的问题。但是，本文只是经济学家集中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并不是全面分析政治方面的问题的论文。

匈牙利的改革并不是一次突发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理论的历史开始于G·彼得（György Péter）发表的对旧体制进行深刻批评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论文（1954aH, bH）^①。实际改革的历史开始于1956—1957年废除农产品的强制收购制度，虽然在1957—1964年期间旧的行政性经济机制仍旧占支配地位。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进行了一整套实质性的改革。后来，改革进一步有所发展。但是，即使在1968年以后，改革的过程并不是沿着单行道前进的。改革推进了，但接着又发生倒退。在60年代末改革的大浪潮以后，1972—1978年代表了反改革势力活跃的时期。1979年又开始了新的改革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除了不断发生的前进和倒退外，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倾向在任何时候都是同时出现的。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讨论改革演进的历史。本文将集中于分析贯串于1968—1985年间的普遍现象，并说明目前状况的特点，只是偶而回顾一下历史。

① 对改革历史，包括对改革理论史的分析，可看伊万·蒂·贝伦德（Iván T. Berend）（1983H），伊万·彼多（Iván Pető）和山道尔·热卡克斯（Sándor Szakacs）（1985H）的著作。拉斯洛·萨缪利（László Szamuely）（1982, 1984）和亚诺什·玛递尔斯·考瓦克斯（János Máttyás Kovács）（1984H）的著作主要研究改革理论史。

西方读者将会感到，在他们自己的经济中，或者至少在他自己国家的政府公有部门和行政部门中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如果对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异同进行讨论，这将肯定是有益的。在西方也有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文献，它们从西方的角度讨论本文在谈到匈牙利时的同样问题。例如，在非社会主义经济中，在税制、价格和工资调节、私有化以及政府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除了偶尔的提示外，这种对比研究和对有关西方文献的考察，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第二章 概念的澄清

表达我们思想的有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内涵。我们并不企求对这些概念作出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明确的定义。因此，这部分的目的仅仅是用比较实用的方式去说明本文所使用概念的意义。

2.1 经济体制

我们使用的“经济体制”^①这一概念不仅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属于不同“家庭”的基本制度，而且是指这种家庭内的特殊成员。例如，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有着不同的体制。

代替对经济体制下抽象的定义，我将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概括地列举如下：

经济运行的组织：例如，行政管理机构、非赢利的机构、企业、家庭、联合体；

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分配；

决策权的分配；

信息结构：各种组织之间信息流的类型；

激励决策者的各种刺激；

政治机构和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

法律和政府的决定，即经济运行的正式的法律规定；

^① 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在原文中是一个词。——译者注

非正式的“竞赛规则”：用习惯的行为方式强化、阻碍或补充正式的法律规定。

以上列举是不完全的^①。各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不能被任意地挑选。

在匈牙利文献中，“经济机制”或者“制度环境”概念已经多少被当作“经济体制”的同义词。

我们把“政策”概念同“体制”概念作一比较。政策是指政策制定者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决策的一定的变量。在这方面，我们遵循了匈牙利讨论的习惯，始终把经济政策问题和经济机制问题加以区别。

2.2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

体制必须使它的成员即个人和组织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协调起来。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两种纯碎的协调类型加以区分^②。

第一种形式：行政协调^③。这是一种进行协调的个人或组织和被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纵向关系。控制由多级的行政机构来实施。行政强制和法令强迫个人和组织接受来自上面的指令和禁令。纵向关系延续下来，并加以制度化；它是为“上面”和“下面”所共同承认的。这些行为是非货币化的。但是，如果需要货

① 比较经济学文献中对“经济体制”这一概念的各种解释大部分都不完全一致。例如参见埃冈·纽伯格 (Egon Neuberger)，威廉·达菲 (William Duffy) (1976) 和约翰·穆·蒙泰斯 (John M. Montias) (1976) 的著作。

② 更多的分析见科尔内 (Kornai) (1984) 的文章。该文受到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922] (1947)，卡尔·波拉尼 (Karl Polanyi) (1944)，查尔斯·林德布鲁姆 (Charles Lindblom) (1977)，奥利沃·威廉姆逊 (Oliver Williamson) (1975)，乔治·康拉德 (György Konrád) 和伊万·热里尼 (Iván Szelényi) (1979) 等的著述的影响。

③ “行政”这一术语在东欧的文献中常常用于贬义。本文并不追随这一习惯，按照韦伯的传统，这个术语表示一种价值不占主导地位的特殊的协调形式。

币，那么下级的个体和组织在经济上从属于上级的同类组织。行政机构在资源的分配和收入的再分配中起积极的作用。

第二种形式：市场协调。这是一种买方个人或组织和卖方个人或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双方从法律观点来说是平等的。盈利成为个人和组织的动力。纯粹形式的市场协调是通过买卖双方协议的价格进行的。这些行为是货币化的^①。

有些作者对市场协调有更广的定义，但是，本文将始终使用以上所说的较窄的定义。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在货币、价格和利润发生作用时，才谈得上市场协调。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争论可以翻译成以上分类的语言，即争论的参与者建议采取这两种基本形式的何种结合。现实世界的体制变化可以被描述为这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新形式，改变这两者的相对分量，并建立它们之间的新联系。

2.3 改 革

改革是全世界的许多政党和政治运动广泛使用的概念。本文将使用仅供我们讨论用的较狭义的概念。我们所用的改革概念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化，表示减少行政协调的作用，增加市场的作用。

由电子计算机进行的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经济的现代化并不是“改革”。以加强劳动纪律为目标的努力也不能称为“改革”。这类政策措施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并不包含体制的变化，不会减少行政管理的作用，提高市场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三个国家正在进行真正的改革。按照改革开始的时间排列，它们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大概接着将写上波兰。

^① 还存在另外一种基本的“纯粹”形式，和这些形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就本文的题目来说，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就足够了。

第三章 国有部门

我们把经济区分为两大社会部门：用国有资金进行生产的组织即国有部门和经济的其余部门即非国有部门（我们用社会部门来表示具有不同形式的所有制部门）。

必须着重指出，国有部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匈牙利经济的基本部门。如表 1 所示，官方统计的国民收入总数的大约 2/3 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①。

3.1 指令性计划的废除

我们首先对改革前用行政办法管理国有部门的“命令经济”作一简短的描述^②。通常的同义词是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古典的社会主义经济、苏联模式的经济、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与改革后的“新”体制相对照的“旧”体制。

国家计划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由最高的政府机构批准。因此，计划带有严格的指令性。经济由按等级制组织的各级行政机构来管理^③。最高层决定的计划指标是自上而下逐级下达的。

① 官方统计中未包括的产出部分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② 更详细地描述这种状况的有下述作者的英文著述：大卫·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1954），科尔内[1957]（1959）、尤素夫·伯林纳（Joseph Berliner）（1957），巴拉沙（Balassa）（1959），弗·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1961]（1972），阿列克·诺夫（Alec Nove）（1978, 1983），莫雷斯·伯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1981），格雷戈里（Gregory）和斯图亚特（Stuart）（1981）等。

③ 本文没有专门讨论党的作用问题。党组织并不象非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单纯的政治团体，而是负责处理各种事务的机构。尽管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党和政府是完全应该分开的，但实际上，它们分不开，共同参加了所有有关的决策过程。在联合行动中，党具有领导作用。因此，本文所说的“行政机构”或者“行政控制”概念也包括了党的机构的作用在内。

表 1 社会各部门在全部就业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靠劳动挣得收入者人口分布				国民收入的分布		
	1966	1975	1980	1984	1975	1980	1984
1. 国有部门	65.0	70.9	71.1	69.9	73.3	69.8	65.2
2. 非国有部门							
(1) 合作社	30.7	24.9	25.5	25.9	17.8	19.8	20.6
(2) 家庭农业	—	—	—	—	4.0	3.2	2.8
(3) 辅助生产	—	—	—	—	3.0	3.7	5.9
(4) 正规私营部门	4.3	4.2	3.4	4.2	1.9	3.5	5.5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按照我们的分类，无法获得1966年时各部门对国民收入贡献的资料。

注：非国有部门我们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核算体系即“实物产值体系”(MPS)中，“国民收入”指的是净产值。表中除了家庭农业和辅助生产之外的其他部门都不包括非正规私营部门在内。

因此，基层国有企业每年要接到成百上千个指令性计划指标。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一系列的产出指标。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实物量来表示，也可以用某年的固定价格计算的总产值来表示。生产多种产品的企业则有其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指标。第二，投入定额。同样，有的以实物量来表示，有的以实际价值来表示。这里包括由中央分配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份额，它不仅指数量和质量，而且指定了供应者。这里还包括劳动定额和工资基金。第三，关于生产成本、利润、信贷的最高限度的指令性财政指标。第四，规定企业的某些活动：采用新技术或生产新产品、确定新的投资项目等等。尽管所有的计划指示都是强制性的，但某些“重点指标”制定得更严格。例如，至少是总产值指标、工资支出的某些限额、有时某些特定的出口指标，就规定得特别严格。

信息流并不是单向的。企业可以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提出建议，还可以在执行计划期间和完成计划之后报告执行结果。但是，更重要的信息流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即上级给下级发出的指

令。

指令性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刚性。命令一旦下达，就很难改变。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不同部门和一级一级的批准过程。当然，详细的计划指标体系是相互依赖的；它是一种关于未来经济过程“一般均衡”的前景。这就说明，任何重大变化所形成的缺口，都将对所有其它部分产生影响，并要求对计划作适当的调整。但是，计划制定者完全懂得，他并不喜欢这种多余的工作。其结果就是对供求和技术的突然变化的反应非常缓慢，而又很不完善。

最高的计划者试图保证“紧张的计划”（Holland Hunter 1961）。计划必须具有一种“动员”的作用，能够从既定的资源中得到最大的产出。这是造成计划刚性的又一原因（因为已经没有易于支配的供迅速调整用的资源）。此外，计划导致了在次要部分上，采用防御性的做法。企业经理的利益促使他隐藏企业的真正能力，得到一个宽松的计划，以便在供给品没有按期到达时也能轻松地完成任务。当然，上级机关对企业的状况很了解。于是，对计划进行讨价还价，上级计划者想用较小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而下级的想法正好相反。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经理的动力是完成计划，或许还有一点超额，但是这不能做得过头。因为今年超额完成的部分将并入下一年的指令性指标。结果是生产受到了限制^①。

投入和产出的组合被扭曲了。扭曲的方向取决于“优先”指标的性质。例如，总产值指标规定得特别严格，那么经理的利益就在于用大量昂贵的材料来生产产品。如果产量指标是吨，或在纺织工业中是米，那么经理的利益就在于生产重型产品或细布。

^① 东欧自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基年法”。西方文献中引入了一个恰当的名称“棘轮原理”〔见伯林纳(Berliner)(1957), M·克伦(Michael Keren)(1972), M·克伦、J·米勒(Jeffrey Miller)和J·R·桑顿(James R. Thornton)(1983)〕。

产出计划在任何价格情况下都必须完成，从而忽视了所有其它“不重要”的指标和行政部门很难检查的指标，如提高产品质量，引进新产品，降低成本，经常维修机器和厂房等。

在国有部门中，命令经济运行的抽象模式是官僚机构按照严格的纪律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严格的纵向行政控制。现实的命令经济并不象模式那么“纯”：一些横向协调也是存在的。这种协调部分地是建立在非金钱的基础上的：生产者企业和使用者企业之间建立了互相帮助的非正式协议，有时为了得到更加可靠的供货，也用货币对供应者进行一些刺激（这是半容许、半禁止的“市场”关系）。总之，50年代初匈牙利的国有部门的体制是相当接近于纯命令体制模式的。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产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例如，产生了一些有限制的职工利润分成形式。60年代中期，改革的讨论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讨论的问题是国家在废除指令方面应该走多远。后来，领导采纳了激进的解决方案。经过仔细地准备后，从1968年1月1日起一下子全部废除了整个短期命令体制。国有企业正式地被宣布为拥有短期产出和投入的自主权。

在东欧，正统的经济学家曾经担心，没有了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体制将要瓦解。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本文将对匈牙利改革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是，这决不是低估匈牙利经济体制变化中一个最突出和无可争辩的结论：即使在没有充分发达的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一下子废除短期指令计划也是可行的。

3.2 双重依赖

什么将取代命令体制呢？改革后的匈牙利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在“双重依赖”的条件下活动的。它既纵向地依赖于行政机构，又横向地依赖于它的生产资料供给者和它的产品消费者。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国有企业的活动就可以描绘出这种双重依赖的体制